

港台問題是一體兩面 一國兩制再啓蒙 (下)

黃賢

2015. 05. 11

新生代的出現，傾倒了天平，令兩岸老人們束手無措，連連犯錯。北京方面，認為新生代反對白色恐怖，是台獨；講人權，是台獨；推崇鄉土文學，講台灣人民，自詡黨外人士，更是台獨。這種港人現在也熟悉的亂扣帽子的做法，蔓延整個七十年代，至今陰魂未散，還有傳染的態勢。



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是同一問題的兩面，這邊敲那邊響，不能因為香港回歸了，就各走各路，變成兩張皮，把一國兩制貶成「統戰手法」。(亞新社)

戰略轉變第二步：兩個「寄希望」

戰略轉變第二步，和第一步幾乎同時開始。「寄希望於台灣人民」vs「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關鍵，是如何攻心服眾。說是容易，但很難避免墜入兩個陷阱，特別是上年紀的人：其一，訪親尋舊取暖；其二，漠視新生事物。目前香港政改是否歷史重演，正正掉入這兩個坑？

兩岸高層一直有聯絡。1972年周恩來和尼克遜談判時，還不經意透露一點，令尼克遜吃一驚。但都老了，派往香港接觸的熟人，還老死異鄉。鄧小平和蔣經國是同學，所以兄來弟往，以為再來一次國共合作，哪怕藏污納垢，台灣問題就能解決。這就是長期執行的「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政策：只要能把領土要回來，再獨裁再反動都可接受。往後的一國兩制的論述，還刻意預留這模糊地帶，保留在憲制以外的合作空間；但《香港白皮書》不知是刻意還是無意，但我猜是大意，堵死了這空間。

然而，新生代的出現，傾倒了天平，令兩岸老人們束手無措，連連犯錯。新一輩生於國府遷台後，因為是戰後嬰兒爆炸一族，人口還特別多。從小背誦歷史潮流浩浩蕩蕩，受越戰保釣洗禮，難免旨在反威權尋定位。

北京方面，認為新生代反對白色恐怖，是台獨；講人權，是台獨；推崇鄉土文學，講台灣人民，自詡黨外人士，更是台獨。這種港人現在也熟悉的亂扣帽子的做法，蔓延整個七十年代，至今陰魂未散，還有傳染的態勢。海外支持島內新生代的人士，也成受害者，備受打擊。

特別是 1976 年「陳明忠事件」後，中調部還發動其海外追隨者聲討；而今回顧，可以說，七十年代冒出的台獨，中調部功勞很大。

國民黨抓共產黨罵，怎麼辦？

首先，要向新生代致敬；他們堅韌不拔，成爲今天社會的主流，帶領台灣進入新境界。而面對內地這種打壓，必須按中國特色的方法應對，要做好功課。首先要搶旗幟，繼而戰略包抄反擊，細節不便說。但當時北京的消息來源難免一左二窄；相反，多年來海外人士掌握大量及時的島內一手公開和不公開信息，數量之大，部分要在 1978 年在香港辦《消息報》，通過左派系統印刷，在內地內部發行，以翔實的資料說明官方論述外還有客觀論述，證明光「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已行不通，還會起反作用。



消息報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第一次提出：「我們寄希望於1,700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不僅調整了政策，還為「台灣人民」解禁。鄧穎超日後當上第一任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組長後，還為不能更早改變戰略向保釣人士道歉。

兩個「寄希望」的思路，是個突破，但一點也不容易實施。拉攏當局、建制派容易，手段也簡單，給點好處加個頭銜往往奏效。贏取民心則困難多了，往往淪為「蛇齋餅粽」。而官員錯誤的執行，反過來足以動搖一國兩制之本。

「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臨門一腳

完成兩個戰略轉變還不夠，畢竟國大慣性也大，還得通過偶然事件，讓必然的趨勢實現。

1980年1月，鄧小平發表講話，題為《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此題目是很有自信的最高領導在歷史轉折點才用），重點是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二件事，是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我們要力爭八十年代達到這個目標，即使中間還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也始終是擺在我們日程上面的一個重大問題。」

現在看來，想在八十年代完成統一，是異想天開；當時雖然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但都沒辦法。我手上已經沒有原稿了，但總是覺得現在發表的版本在輕描淡寫這問題，因為鄧確實有點飄飄然。

首先，國際形勢相對穩定。中美已經建交，中日也簽了友好條約，台灣領土問題徹底解決，何況中美之間雖然有對台售武的麻煩，卻已開始軍事合作（能解讀 9 - C，就你懂的），年前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合作空間還要擴大，延伸到國外。

其次，有關部門為補其前期不足，矯枉過正，顯然是情報和判斷的嚴重錯誤所致，但也投鄧所好，因為他多次表示：「由我們這一代來實現，實現統一，遲不如早。」要說明，1978 年以前，台灣工作主要是軍事和情報，如地方的對敵鬥爭領導小組下設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當時黨中央尚未成立後來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更沒有國務院港澳辦、台辦，這些是 1978 年底才草創，班底不齊，尚未能真正起作用。

很快就認識到判斷錯誤，也加快鄧滅掉中調部的決心。此後兩年，逐步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長期性和多面性，必須全面系統地論述。更明白兩個「寄希望」不能偏廢，特別是不能僅靠兩地權貴坐下同意就行，還要顧及人民接受與否，並且要仔細處理多方面的具體事務。

較成熟的表述，是一年半後的「葉九條」。這是葉劍英在 1981 年國慶時的講話，即「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九條方針政策」。「葉九條」提出或重申九方面的具體措施，如：「自治」、「保留軍隊」、「三通」等等。雖然第一條還是強調黨與黨對等談判，但其他細節確是照顧到台灣人民的利益。雖然立刻被台灣拒絕，但不失為談判的起點。條件成熟了，一國兩制雛形已呼之欲出，就待合適機會宣布。

走向一國兩制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首提一國兩制。官方記錄是：

「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破壞他那個制度。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子孫後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們是從這樣的角度着想和對待這個問題。說什麼「統戰手法」，我們不搞。我們講大政方針。沒有這樣的氣度不行。」

全美華人協會成員多是美國學術界知名人士，首位會長是楊振寧；我有幸參與成立該協會，但當天我剛到秦城用膳。李耀滋是第二任會長，但和其他學者經歷不同，抗戰時期在國內，成立中國第一家飛機製造廠。他在 MIT 任教多年，交友甚廣，奇遇甚多。

鄧小平選中此場合，一方面是該協會成員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是知道李耀滋能傳話給蔣經國。李耀滋對此很低調，日後只願意說蔣安排章孝嚴、蔣彥士和他見面，事情真相還待台灣方面公開有關文獻。幾個月後，廖承志就寫信給蔣經國；有沒有因果關係有待研究。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AMERICANS

全美華人協會

SUITE 608

1003 K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1

TELEPHONE (202) 347-4385

June 20, 1978

Mr. Hanson Y. Huang
Baker & McKenzie
Prudential Plaza
Chicago, Illinois 60601

Dear Mr. Huang:

1. I hope you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Articles of Amendments which I sent to the Recorder of Deeds, Washington, D. C. early this month. It was filled out properly and signed by members of the D.C. chapter.
2. The proposed resolution for the amendment of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was also voted upon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t was passed by an over two-thirds majority.
3. I received a copy of the draft of the revised bylaws. Let me thank you for the hard work you have devoted to this job. I have asked that the bylaws be distributed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consideration at the next meeting.
4. I shall be leaving in a couple of days for China, Japan and perhaps Korea. I shall be back in early September.

With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Chen Ning Yang

CNY:ct

全美華人協會成立文件 楊振寧致作者函

要傳遞的信息估計分三各層面，是一國兩制的核心意義：

首先，在政治層面，闡述了在「一國」前提下的制度對等政治安排。

第二，在操作層面，是從長計議，不是權宜之計，不是引君入甕的手段，不會輕易更改取消。

第三，在心態方面，是誠心包容根本性甚至對立的差異。

人心向背，就看執行的寬嚴。從寬執行，一國兩制可能成功，反之必敗。也要清醒認識到，沉重的歷史包袱，執行傾向失之於太嚴。

這三條之外，和香港有關的還有第四條。鄧小平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會見戴卓爾首相時表態說：

「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香港問題，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台灣問題。只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

一國兩制現在看來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國人堅信是行得通的，因為這兩年的談判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構想在解決香港問題上起了不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同樣地，到本世紀末和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也需要一個穩定的台灣。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兩種制度，這就是制定我們國家政策的一個想法。如果懂得了這點，知道我們的基本觀點，知道我們從什麼出發提出這個口號、制定這個政策，就會相信我們不會變。」（註一）

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是同一問題的兩面，這邊敲那邊響，不能因為香港回歸了，就各走各路，變成兩張皮，把一國兩制貶成「統戰手法」。可以用以上幾條衡量北京是否信守諾言。

一國兩制：走向明天

重溫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和核心意義，不是為了推測其日後成敗，而是想說明其來之不易，更擔心其去之也快。

回顧整個歷程，在短短幾年內完成兩次戰略轉變，確實不易，算是個創舉。遺憾的是，這要歸功於幾個影響力日益遞減的要素：

首先，當年文革剛剛結束，痛定思痛頭腦清醒，急迫要找出路，不得不虛心聆聽不同意見。

其次，當年台港澳問題決策程序簡單，尚未設立各層機構，所以並未官僚化。更因是窮親戚，溜鬚拍馬攀援的勢力不多，所以另類合理意見容易「短路」正常渠道，得到採納，更因反饋及時，有利形成成熟的政策。

第三，香港/海外一直起到特殊作用。最好的例子是新華社副社長祈烽；他雖然領導 1967 年的香港左派暴動，但香港回歸問題提出後，因有國外工作經驗，顯得十分理智和剋制。當時有關部門籌備拍一套有關香港的紀錄片，他讓我過目劇本，發現多處未能擺脫「左」的陰影，遂立即終止該計劃。30 年後，在幫忙解決一起所謂「間諜案」時，他還透露曾建議新建立的台灣辦事機構不要稱「對台辦」而應稱「國台辦」，避開錯誤的敵我意識。其實，黨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

組，也應放棄延續戰爭年代的稱呼，改為中性的台灣工作領導小組，避免錯誤的心態潛移默化影響工作。

逝者如斯，一國兩制奈何？

本系列文章：

[政改要攻城還是攻心——一國兩制再啓蒙（上）](#)